

我们的
1978

西南政法学院

纪
事

舒扬 著

舒扬 著

我们的
1978

西南政法学院

纪事

南方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1978: 西南政法学院纪事 / 舒扬著.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652-792-4

I. 我... II. 舒... III. 西南政法学院—校史 IV. D9-4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7395号

我们的1978 ——西南政法学院纪事

舒扬 著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2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卷首语——

“进五奔六者”的献辞

此书写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中。

范仲淹的名句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无奈，现作者本人属两头不靠岸的水中浮萍，腹中虽也有些经纶，但已忧不了民，且不愿忧君，只好自娱自乐地把玩西南政法学院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了。西南政法学院，在过去罕有“品牌”的年代，尤其是在不知法律品牌为何物的岁月里，好歹被人弄成了一个不错的可被追认的品牌，在进五（十）奔六（十）的建校史中，有我这个岁数上也“进五奔六者”的整整三十年西政情怀空间。虽然作者很欣赏“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一说，但最近经不住一些当年同窗校友关于入读西政三十周年话题的挑唆，心地旷野汹涌上来了思春念旧的情潮。回想，就是一面大得无边的镜子，你在清晰地看到别人之时，也模糊地呈现了自己。时至今日，我还是身边无一物，唯有读书写字台。那就排除世俗的私心杂念，潜心于笔耕吧。耕读是良善人家的本分，我未居庙堂，也走不到江湖之远，人陷高楼、心困俗务，只好素笺当田、竹笔作犁、勤力为牛，自己走火入魔地深陷于远逝的前尘影事、风物人语，在久违的同学情的静美幽香之处，去杜撰一片虽不应时令，但又还不是反季节的收成。

撇开太多的客气话，我要说，此书：

谨献给一茬接一茬的西政毕业生，敬请各位照照这面老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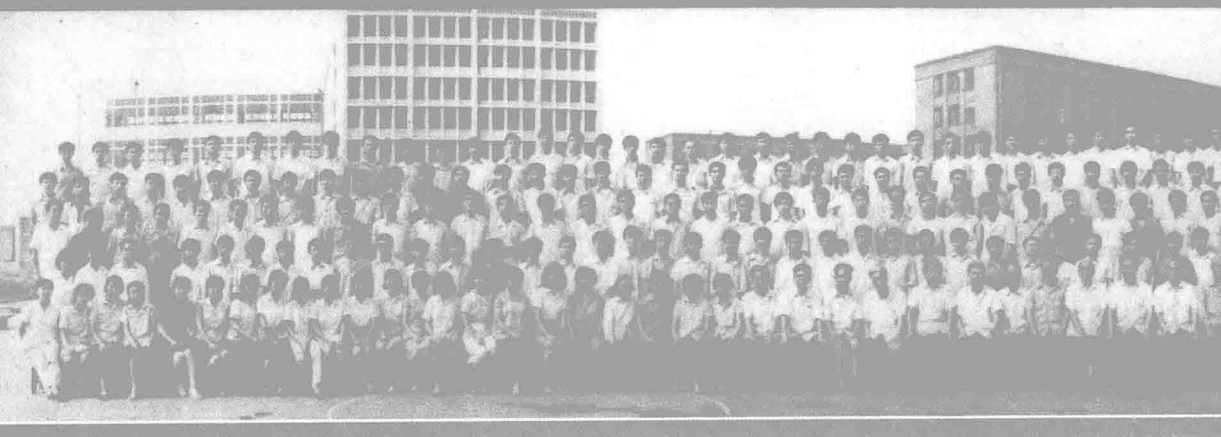
谨献给一茬又一茬的想读西政的青年人，不妨在填报志愿时三思而后行。

谨献给西政七八级当年在一口大锅里争吃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得罪之处，还望各位海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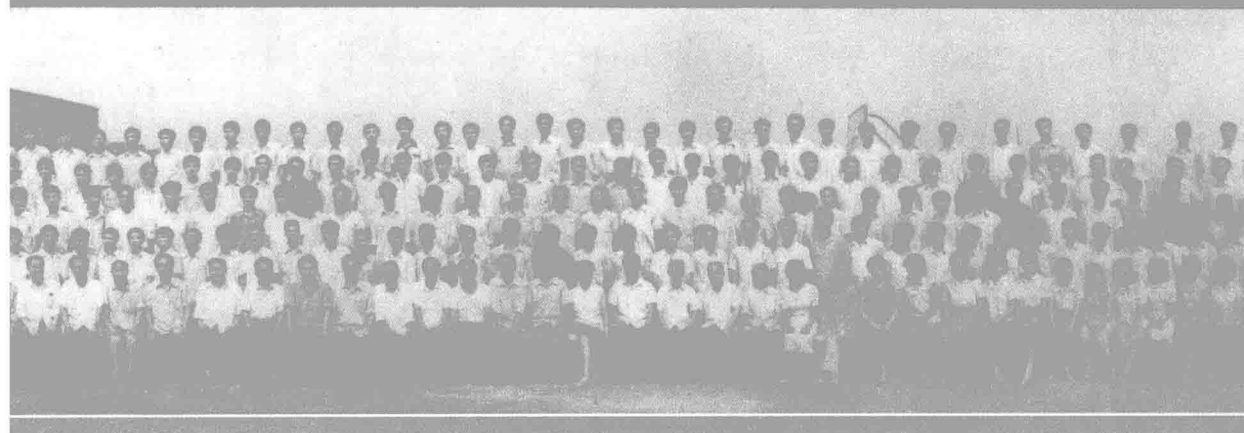
谨献给当年教过我们的师长们，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安详地围绕在马克思、毛泽东身边，完全可以像现实中的“领导身边的人相当于领导”，领导身边的人说你坏话，比领导要办你更厉害。如有得罪，早点调我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那边去，跟曾经厮守的师长们在时光的深处无忧无虑地陶醉，在我看来也是挺幸福的！因为我这边，好乱哦。

嗨，2008，总有些事情，让眼中饱含苦水……

西南政法学院七八级法律



專業全體同字畢業留影一九八二年七月



目录

一	上路求学	001
二	新生接待站	006
三	东山大楼	010
四	游逛重庆	016
五	开学典礼	020
六	校际冲突	026
七	领导印象	033
八	中层干部	043
九	老师述怀	060

十	同学旧事·····	098
十一	绰号意趣·····	146
十二	师资班的『小闹』·····	154
十三	学长在先·····	165
十四	考试趣闻·····	174
十五	讨论『蒋案』·····	183
十六	文体生活·····	201
十七	非典型学者·····	227
十八	回望『西政七八级』·····	257
	后记·····	294



上路求学

公元1978年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正处于饱满午睡后的慵懒状态。往常这个时刻，应该是在静心地观察、等待一个透明茶杯里的“成都花茶”被泡到渗出淡淡的清香，尔后，会找来一份通常在小县城里私人订户不会多过五六家的《参考消息》，看看亚非拉国家有没有发生什么反美反苏的、需要中国施之以援手的事情。

当日却不如常。眼中没有外物，心头绝无念想，灵魂仿佛完全游离于肉体，我不知也不想知自己是谁。自个儿寂寥地静坐在藤制的沙发上，是在等待什么吗？因为在过去的人生体验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心境。

冥冥之中的使者来了，是一个陌生人轻轻敲着我朝街的玻璃窗，问道：你是舒扬吧？县教育局有人找你，你赶快去一趟吧！

县教育局有我的事？那准是我考大学的事情尘埃落定了。尽管左邻右舍还没有人开始议论谁谁家的娃儿被大学录取了，但我认定是我的入学通知书到了。

1978年的高考是我的第二次高考，大学录取我，也是第二次的录取。难怪，我一点都没有激动，只是想知道一下究竟我要上的学校是哪一间，似乎，先闻后知都显得很无所谓。

为了故意显摆我对上大学读书的自信和淡定，我特地穿了双木板拖鞋（也就是日本人说的木屐）一步一响地晃向离家不远的县政府，教育局在那个由多个四合院连体的机关里有三五个小间。

一位矮壮如牛，脸大如面盆底的负责人连我的姓名也没有问，就递给我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负责人的冷漠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的第一次高考及

录取，给领导们添过麻烦，曾造成他们被城镇居民群起诟病的影响。

小县城里，居然有人敢因维护自己的权益与政府部门抗争，尽管这种抗争是自虐式的、温良恭俭让的而且也是完全无效的，但这已经清楚地构成了乡村政治的大逆不道。能不再扣发大学录取通知书都已算是良心发现了。

负责人隔着他那脏乱的办公桌递给我牛皮纸信封的情形，我感觉有点类似于二战结束时德国与英美苏法签署停战协议、交换文本时的气氛。我连信封上怎么写的都未看一眼，就不曾小心地敲响自己的步伐转头离去。

毕竟是关乎将来的事，我还是忍不住在步行过程中拆看了函件。函件上手书的汉字特别典雅秀丽，能把我的姓名写得如此大气和飘逸，可见手书者至少当时对他要写的文字是十分专注的。信封的下方落款是西南政法学院，一看便知道，这校名题字那是大文人郭沫若的手体，显然，让人看得出是郭沫若先生的应付之作，提笔时，郭大人肯定或者根本不在意是否在最佳状态。

怎么会是西南政法学院？

我父亲一直想我上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没有指定专业）或者上海的复旦大学新闻系。

我自己很想进北京大学，因为读过不少文字，记录了发生在那里的故事。第二志愿填报了四川大学，这所老牌大学坐落于成都最好的街市口位置。我小时候经常被大人牵着手，从它的校门口行注目礼路过，心内总升腾着一种向往的情绪。

后来听说，西南政法学院是以两大强势，才得以抢先将它相中的考生收入囊中：一、它是全国重点大学中唯一的法律类院校，“文革”后首次招生，而且，该次复办招生是报经邓小平先生亲自御笔批准的（也有一说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签字同意的）。二、它是以当时绝密专业招生，政审相当于当时公认十分严格的招空军飞行员的级别。

回忆起来，我当年对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并不感冒。我当时认为，法律不过是衙门的替代词，搞法律的人，无非就是县城公、检、法机关里的那些神秘人物，杨乃武与小白菜之类的民间苦难，不就是些坊间传闻中的“法来法去”的事吗？我青少年时期居住过的小县城、小镇乡生活，大致都是与医院、学校、文化馆、图书室、剧团、百货店纠缠不清的。与法律相涉，那无疑就是要飞渡到另一个似乎有些恐怖的世界。

知子莫过父，父亲对我的郁闷十分理解。于是他开解我：你读的是西南政法学院师资班，师资班那就是将来可以教书，不会逼你去拿枪弄棍。听罢，我堵在心头的闷气，开始了半推半就式的疏散。但是，因为当时大学录取通知书送达初潮未至，“怎么这么早早的有人就被招了呢？可能是考得太差，只好去将来要干体力活的学校吧。”小县城略知我去向者的暗议，一次又一次地冲销和衰减着我上大学的美好憧憬。

暮秋的川北就开始了半昏半暗天色的季节。

可以被简单概括为压抑情绪的乡愁，是山乡县城生活的普通元素。

我几乎是灰溜溜地离乡背井，心如止水地走向西南政法学院的。我的人际圈子里的亲朋好友，几乎没有人由衷地祝贺我考取了这所学校。乡下人都很实在，没有觉得西南政法学院是个好学校。它地处重庆，重庆算得了什么？首都是北京，商都是上海，四川的省会还是成都呢。重庆是个山中之城，抗战时期国民革命政府无奈将它弄成了陪都，但它说上了天，也不过是一个扯开拉大的大山包抄了的县城。可能是小县份的人去到重庆都受到过欺辱，回来的人好像都喜欢咬牙切齿地讲重庆这个地方的坏话和怪话。听说，当时的重庆崽儿看到外乡人进城就哈儿、哈儿地叫，还根据小地方男人一律样式的发型，叫外乡人是“县乡一匹瓦”（即头发像是给各种头型的脑袋统统扣上一整块瓦片）。这得罪面也太宽了一点。西南政法学院地处重庆，它在外乡人语境中能好得了吗？不像人家北京，哪怕是当时的通县之远，昌平之偏，只要校名前冠个小北京字样，黑乌鸦一眨眼就能变成金凤凰。

社会上的人似乎对高等院校始终都是无知的，老百姓总是以这个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在他们眼力所及的范围内在干什么来评价这个学校的优劣。西南政法学院的毕业生在我生活过的那个川北小县也是有的，有人在县食品公司看仓库，有人在五金商店站柜台，混得好的是在离县城近一点的农村中学教政治课，背时倒灶的还被发配回乡下自个儿开染坊。毕业生的不济、不肖、不威、不爽，致使西南政法学院在一些偏僻之地的民间，成了不冷不热的温吞水。

在长途汽车站，我很不好意思地遇到了几个去重庆转车到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上大学的同龄人。车上，我肯定是郁郁寡欢，需要人家关注一下情绪、给点人文关怀的那位。我始终不肯讲去重庆上哪间大学，结

果有人安慰我，重庆是不怎样，但重庆大学也还算不错，毕竟是老牌的全国重点大学嘛。我在长途客车的晃荡下无言以对，只能对着一晃而过的窗景苦苦一笑、又笑、再笑。

其实，关于西南政法学院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报到的记事，还有更多的反映和写法。相比之下，我的上学路属于极个别的现象。我把那份凄冷与荒凉讲给同级次的同学听，他们大都认为我在吹牛、扯壳子。这些家伙都是春风得意，趾高气扬地进学校的。有位同窗的老爸是某县委书记，他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的消息是全城贴红喜报、县广播站重复讲新闻联播一样昭告县城众生。一时间，这个县城的主流舆论，把西南政法学院排到了北大、清华之前。该同窗一时间也被忽悠得感觉自己就是藏族地区选出来的“转世灵童”。据他说，他那时根本就没时间尽情地享受各方面的朝贺，县城仿佛获准放假三天自行活动，为满足欢宴排期需要，这位仁兄居然迟了一个星期才到校报到。

还有位帅哥是乘着五部军用吉普车来学校的。一人坐五车？我等不解。学友解释，硬要来送的人多车多，他便选定五车，路上分段换乘，根据利害大小，感情远近，各车乘坐的时间凭心而论定。

令人感动的是福建有位义士，第一次全国高考分数极高，他拒绝了所有好学校的招录，一门心思要读西南政法学院。因当年当次，西南政法学院还未从邓伯伯那里拿到批文，所以未有动作，我们这位义士宁可放弃全国高校招生的“头啖汤”，多等了半年，再考又以极高分进了西南政法学院。此君父亲也是部队高干，可以想象他的上学路是何等的波澜壮阔，绝对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赴岭南收复粤地的进军气势。

也有风光中夹带羞涩、豪气中时有泄气的来校个案。比如，有位同学是从郑州一路站火车站到腿肿才到了重庆。该生家中存粮不多，但父母给他烙了半麻袋芝麻大面饼，让他驮着上路。干啃面饼必定影响他站在车厢、岿然不动的底气，他只好开始向旁边座位上的乘客要开水喝，喝了人家的水就得跟人家攀谈，一听说他这是去重庆上西南政法学院，有个女乘客吃惊得把水杯都打翻落地了。

说风光中夹带着羞涩的那位，是根本就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就在乡党的鼓动下一起来学校碰运气的。据说，此君在当地招生办有舅子老表之类的亲戚，人家说他被西南政法学院录取了，光荣册里有他的名字。但录取

通知书始终与他本人缺乏一面之缘。眼看开学的时限快到，他便大胆厚着脸皮地决定去到学校再说。如果是场误会，顶多算是游了一趟四川。由此可见，这位先生的上学路虽然有乡党成群、自享欢乐的风光，但偶尔惹动的另类心情，肯定不会比也在同条路上的我轻松多少。

还好，在牛角沱西南政法学院新生接待处的新生册子上有他的名字，领导在耐心听完他装出极度委屈的诉说之后，很快又给他补办了一个正规的录取通知书，以免历史再出更多的误会。事后，该同学突然间又接到了老家寄来的“原装”大学录取证书。原来，问题出在当地招生单位，有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这份宝贵的录取证书翻看之后，混夹在一叠报纸里面，而报纸又被清理堆放于书柜上方，等到需要卖报纸换钱打牙祭，在给旧报纸过磅称重时，一千人大呼小叫着捞出了这份大学录取证书。证书能完璧归赵，这实属偶然的幸运，而我的同学当年敢“无证上路”，足见其是个小精仔，将来必成大器。

哎，重庆到啰！西南政法学院又在哪里嘛？



新生接待站

我的大学语文课教师张紫葛在近九十高龄之际，写出了一本热销书——《心香血泪祭吴宓》。我读后，有九大佩服一项存疑。抗日战争年间，老人家在重庆陪都观音桥一带挤公共汽车，初遇吴宓，当时的场景和感觉上的细节，张先生在书中写得那么具体和逼真，这是在写小说吗？老人家对当年的事能记得那么细微和精当吗？

这种较真式的存疑，在我自己心如古井、情如季风、思如飞梭、泪如滴泉遥想当年时，一扫而空。人的记忆和回忆是十分奇怪的，它绝对可以使时空倒转，不管时间给原貌原物、原人原事覆盖了多厚的尘埃，回忆都能拨开云雾见青天，似乎不需吹灰之力。

为张老先生说话，目的性很强，因为我下面要讲三十年前与西南政法学院同学的初遇，因记忆太过深切，才历久弥新，三十年前的事，恍如只隔时，这是真话。

我坐长途汽车（情形恰如钱钟书先生《围城》中描写的赵辛楣、方鸿渐、李梅亭等一伙人搭车去三闾大学报到）到了重庆市的牛角沱汽车总站。远远地就看到了两根长竹竿架起的一条巨额红布横幅，上面用白漆写着：西南政法学院新生接待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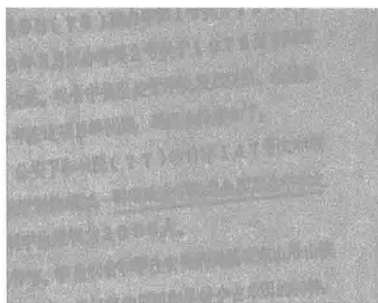
接待站比较冷清，两张长条桌，吸附着七八条独凳在周围，旁边有一个两人伸臂才可合围的保温水筒，水杯倒没有几个，可能考虑了新生都会备带当时十分流行的，年青人特别喜欢斜挎在身上的军用水壶。接待站值班的人员显得有些疲惫，尤其见我一脸茫然，一身带有油渍斑痕的劳动布工装，一口带乡下尾音的四川腔，而且矮小而精瘦，他特别警惕地反复问我是不是来报到的学生。我明白自己这副臭皮囊也难得被人家看好，便老老实实地给



复办请示



复校通知



1978年批复件



国家教委文件

人家看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人家这才态度回春了一些，招呼我坐下，然后忙别的事去了。

我正在纳闷怎么只有我一个新生在此，突然从不远处火车站出口轰轰烈烈压过来一大帮人，领头的是当时的院团委书记黄廷孝老师，他的身形有点类似于我，但显然比我更为清瘦，可以说给人有点孱弱的感觉。用四川土话讲，黄老师有点干精火旺，说话嗓音尤其爱

爬高，不注意就容易走偏为尖叫的女声。黄老师满脑门轻汗地调度他和几位接站干部刚从站台上接过来的一拨几十个新生。他抱歉地让大家在接待站再等等，因为下一班到站的火车上，还有一些同学会到来。

一会儿，两部运兵才用的军用卡车在黄老师的指挥下停靠在接待站，这里一下子变成了街巷边的集市。

新生相互不认识，都有点矜持，凳子少，彼此都客气地谦让，有的人为了让位，干脆抢先坐到自己的背包上了。这拨人中，四川人好像没有，我便向是同省人的黄老师问这问那，突然我和黄老师的眼光都被什么强力拐到另一边去了。那是飘然而至的女生祖玉琴。祖玉琴同学当年可能刚二十出头，女同志嘛，以我现在视觉模糊、眼袋深重的认识看，年轻本身就是漂亮。然而，玉琴同学不仅拥有年轻，她的确集中糅合了四川女孩子的别样动人的靓丽，她身材修长而又饱满，眼睛大而得当而且充满亲善与温柔，笑意好像总是写在脸上，对男生而言既可阿姐也可表妹。我说出这番感觉时要忍不住对叶安民同学照顾几句，别醋醋地审查甄别我对玉琴同学的用语，三十年前的那一次邂逅，还没你呢！

祖玉琴同学可能是从市内哪个亲戚家出来的，没有什么大的行李，她的

介入，有点让外省的同学对四川、重庆刮目相看。我作为四川人，好像这时也开朗了一些，觉得垫厚了一些底气。当然，玉琴同学也还是有些瑕疵问题的，她的四川话自贡音太重，尾语的卷舌力度稍嫌偏大。这一点似乎跟叶安民配合得天衣无缝，安徽人士叶安民讲话的重音也在最后一个字。试想这两口子在家里拉上窗帘各说“再爱我一次”，那个“次”字的发音相互对应碰撞，旁边若要是有人，一定会觉得听起来在音韵学上很有点意思。

古人常说，好事不可重享，但有时也有短暂的例外。在女生祖玉琴频频向周围的人示好微笑之际，另一个佳人又冒将出来，她是一个比玉琴同学更高挑、更白净、更饱满，更显清纯年轻的女子。百姓们说：人是桩桩，全靠新衣裳。这话看来一点不假，该女子穿了一件淡雅的紧身上衣，尤其注意地突出了可贵而养眼的胸线。下罩了件可徐徐生风的长裙，使裙下修长灵动的美腿动乱了多少异性的情怀。

时尚美丽且带有些火热的洋气的女子的到来，让西南政法学院新生接待站在迎到了七八级漂亮女生祖玉琴之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掀起了新一轮别样的情致。根据判断，新到的女子虽气质绝佳，像个名模，但不会是西南政法学院的新生，她跟黄延孝老师亲密无间的交谈，暴露了她是黄老师的的邻居，恐怕是某个同事的小女。我一度盼望能不能分班是跟她在一起，在一个学习小组，最好是紧挨着学号同一张课桌，天天能沐浴在知识和美人的阳光和雨露中，想象正在悄悄地进行，突然黄老师与她的一阵毫无节制的笑把什么都扫除干净了。

跟漂亮女生一起，时间就过得特别显快，下一班火车进站后，接待站的新生增多了不少。我们相互帮扶地将行李和身体弄上了军用敞篷卡车，黄老师手舞足蹈地指挥停当后，跳进驾驶室，催着司机点火上路。在驶往学校的路上，不知是哪位激动不已的新生竟然在首车上打出一面鲜艳的红旗，几车青年人，军车与飘舞的红旗在那个年代是很常见的。重庆街市上一路都有行人和居民驻足静观，似乎没有人回以挥臂和微笑，新生们的激情和亢奋没有与外界形成什么互动。

与我同车的陕西王同学真可谓虎背熊腰，身形简直就是一堵厚实的墙，我踮了下脚尖，也没有让自己的头冒过他的肩膀。江苏来的李同学修长得像一根翠竹，他一脸的斯文秀雅难以掩盖略带忧郁的面相。河南的赵同学成熟得像个县政府干部，表情有点滴水不漏。浙江的郑同学小脸红扑扑的，好像嗓门还滞留在儿童与少年的变声阶段，没错，他那年才不到十六岁。

记忆中的同车人，穿现役军装和洗得发白的旧军衣的占了一半以上，怪不得有人误认为这是哪个部队又在欢送退伍兵了。穿洗白了的军服是当时

的一种社会时尚。要穿，也得讲究，比如，一般不要衣、裤、鞋、帽齐上，那样你最多给人印象像个刚退伍的复员兵。会穿的都只挑单件穿，要么白上衣、黄绿军裤配搭，要么军上装、黑裤头。有的只露出一双军用解放胶鞋，也悄悄地传递了军方的线索和背景。这是一种革命传统，红色家庭的暗示，也是个人资质、品行、能力的象征。要是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确实需要宣示一下武力，当你在说“昨个的嘛，龟儿子是不是想单挑一下嘛？莫做缩头乌龟哦”时，一身上下有点军队颜色的东西衬托着，肯定就能雄起。

重庆这个城市真是有些特别但又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特色。即使是在火车站一带的闹市区，给人的感觉也就是把十几匹大山上斜挂着的陈年老旧的山居民舍凑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合围之势。密密麻麻盖在房子上的瓦片，就仿佛是挂在左邻右舍的门框和窗檐上，视力特别好的女人家，要梳妆打扮一番，只需朝着山那边门当户对的客房的大镜子就可以了。

来不及细看重庆的都市风情，我们坐的车已驶出了被叫着市中心的牛角沱地区，进入了毫无城市迹象的乡野。原来，重庆市是由一个个组团式的若干建筑群组合而成的，它的市中区（标志性建筑是抗战胜利纪念碑）与北边的北碚区相隔好几十公里，其间山峦起伏，江河阻隔，稻田不绝，桑林无际。西南政法学院地处沙坪坝、童家桥的歌乐山中部，小说《红岩》里的“人间魔窟中美合作所”和白公馆、渣滓洞、磁器口也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乘坐的军用卡车一过地势突然变得平坦的沙坪坝，就开始了吃力的爬坡，前车尾部喷出的黑烟，有效地止住了后车语句不清的说笑。进校的道路变得越来越崎岖和泥泞，新生们心里的嘀咕也越来越想往嘴边涌了。

车在一个牌坊老土、残破的小门楼停下，黄廷孝老师率先跳下车，一脸严肃地宣布：这就是学校地盘了，前边的路太烂，车进不去，大家拿好自己的行李，跟我往前走，到东山大楼就是到家了。

清华大学比较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先生在讲大学之谓时，既讲了大师也提到了大楼。黄老师嘴里蹦出的东山大楼，让我为之一振，提上本来就很轻便的行李，跟着越拉越呈其为长线的散漫的队伍，向东山大楼“挺进”。途中发生了两个令人惋惜的细节：一是搭顺风车的穿长裙的青春少女，在校门口下车时的混乱中飘然而去了，没有给大家留下将来任何一遇、再遇的伏笔。另是三五个北方的汉子，已迅速地把祖玉琴同学包围在行进队伍的中段，恐怕就是相互间拿错了行李，也不会是一个什么事了。